

新常态下新发展 > 新思维①

新常态,掀开浙江经济新一页

编者按:新常态已是当下中国经济的热词。从新常态的视角看浙江经济,人们或许注意到了那些变化——关于速度、质量、效益等等。在新常态视角下,更重的任务已摆在面前——在经济减速和提质增效中实现新平衡。

其实,近年来的速度放缓并不意味着要在新常态下不再关注速度。浙江经济要积极适应新常态,必须更加有为。调结构、促转型、尽快形成经济新优势,走上全面、协调、可持续的道路,继续走在前列。从认识新常态的此刻起,新常态下浙江经济运行的列车要行稳致远。本报今起推出一组“新常态下新发展”,报告市场主体的新动向。叩问新常态下的发展新思路、新空间。

本报记者 颜伟杰

在打造浙江经济“升级版”、建设“两美”新浙江的当下,如何正确看待新常态?近日,记者就此采访了数位我省经济政策研究者和专家学者。

新常态,新特征

何谓“新常态”?

省发展规划研究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潘毅刚说,从字面上看,新常态就是不同以往的、相对稳定的状态。这是一种趋势性、不可逆的发展状态,意味着中国经济已进入一个与过去30多年高速增长长期不同的新阶段。而从速度层面看,经济增速换挡回落,从过去10%左右的高速增长转为7%至8%的中高速增长是新常态的最基本特征。

环顾世界,当一个国家或地区经历了一段时间的高速增长后,都会出现增速“换挡”现象。

“不少国家的经济增速都是从8%以上的‘高速挡’直接切换到4%左右的‘中速挡’,而中国经济有望在7%至8%的‘中高速挡’运行一段时间。”潘毅刚认为,中国各个经济单元接续发力保障了发展能量的延续和持久。

省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朱卫江认为,对浙江而言,“新常态是国际金融危机引发大调整、我国‘三期叠加’与浙江发展阶段历史性交汇过程,是多重目标达到的新平衡。经济减速可以接受,但必须在合理区间,要有底线,核心标志是提质增效,根本出路是增长动力完成向创新驱动的转换”。

单从增速看,2009年浙江经济结束连续19年的两位数增长,为8.9%,2010年虽然反弹再次达到11.9%,但2011年、2012年、2013年、今年上半年增速均低于10%,可以说已完成由高速向中高速的换挡。

“浙江经济是否达到了可接受的‘新常态’,更为关键的是规模与质量、速度与效益、增长与转型、生产与生活、生产与生态的关系有没有达到一种新的平衡。”朱卫江说,顺利完成“一三五、四翻番”、实现现代化,是比较理想的速度上“新常态”。

如果增长速度在7%至9%之间,财政增收、企业增效、收入增长、结构优化、环境洁化、生活美化,这才是我们所期待的“新常态”。

新常态,新思维

由于国际金融危机呈现长期化趋势,结构性大调整远未结束,浙江以往由外贸出口高速增长拉动模式已成为过去,而内需的上升量远补不上外需的下降量,产生总需求不足的局面,如何积极适应这种变化,核心就是要在经济减速与提质增效之间实现新平衡。

阶段性大变化和世界性大调整,必然伴随着经济增速的换挡和转型升级的阵痛,但“新常态并非仅仅是GDP增速的回调”。浙江大学区域与地事发展研究中心执行主任陈建军认为,新常态既要有一定的速度,又要有好的质量效益,对浙江这样的传统产业比重高,民营企业、中



小企业较多的省份来说,要求更高、难度更大。

其实,在“新常态”成为热词之前,由于国内外竞争日趋加剧、资源要素成本不断上升、生态环境制约日益严重等因素,对市场极度敏感的浙江就已经在上述的“倒逼机制”的推动下,率先进入了增速换挡、结构调整、改革攻坚的新常态发展阶段。

“‘五水共治’就是浙江积极适应新常态最好的突破。”浙江省委党校学术委员会副主任陆立军说,随着浙江进入新常态,人民群众对水、空气、食品安全等环境要素的要求越来越高,“经济发展的根本目的,是为了满足人的需求,发展到了这个阶段,速度的放缓有了一定的容忍度,但还要尽快迎合人民群众的满意度。”

近年来,浙江配套打出“五水共治”、“三改一拆”等组合拳。污染治理势如破竹,更深层面的倒逼经济转型升级也渐渐打开局面,“四换三名”、浙商回

归、市场主体升级等一系列措施跟进,支撑了浙江经济在换挡期的合理增速。

简政放权,是浙江积极适应新常态另一佐证。潘毅刚说,市场先发和体制创新是浙江经济取得今天成绩的关键。去年11月以来,浙江省政府建成“三张清单一张网”,试点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厘清政府权力边界,打造“透明的笼子”,释放市场活力。

更公平的竞争环境、更公开的市场信息、更规范的市场秩序、更良好的社会信用、更完善的政府服务等,可以进一步破除行业分割问题和阻碍产业链协作的各种因素,推进产业集群、专业市场与电子商务、现代物流、会展经济等的联动协同发展,构建浙江现代经济、新兴产业发展新优势。

改革红利持续释放,经济发展后劲增强,换来了发展质量的改善。中国科学院自2009年以来连续5年发布的《中国科学发展报告》显示,浙江科学发展总

水平均居全国各省(市、区)前5位,2013年GDP质量指数仅次于北京居全国第2位。

新常态,新动力

在当下的经济环境中,GDP质量指数越来越高,这对浙江来说已属不易,但考虑到实现“换挡”之后,浙江经济的大梁由谁来挑起,即经济恢复增长的新动力来自何处?这依然是全省上下正在探索的难题。

为了求得经济增长的“高调复出”,浙江必须找到符合自身的产业定位,并趁机占领高点,才能在未来的发展中占据先机。潘毅刚表示,从上世纪80年代一些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的例子来看,当时美国针对经济发展回落的现状,调整经济改革和产业结构,特别增加了对高新技术产业的投资,实现了日后“新经济”的繁荣。

从浙江省上半年经济运行情况看,GDP增长7.2%且稳中有升;财政收入、企业利润、居民收入均高于经济增长速度;装备制造业、高新技术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技改投入、服务业均高于工业增长;单位工业增加值能耗和GDP能耗下降幅度大大高于全年目标。但经济增速接近7%的下限,下行压力仍然较大,房地产和金融领域等各种风险隐患不少,工业生产增速相对较低,工业持续回升动力不足,核心问题是微观主体信心、活力特别是创新动力仍然不足。

解决这些问题,才能达成“新常态”。朱卫江认为,前30年浙江凭借市场先发、体制创新形成特色跨越发展,后30年要走出浙江特色的创新驱动转型发展之路,续写好“八八战略”大文章,必须进一步深化改革,以改革破解发展难题。能否构筑体制机制新优势,对产业、城市、海洋、生态等新优势形成具有决定性意义。

新常态下构筑新优势,实现产业升级是首要任务,要做好减与增。要根据新常态下新发展的需求,一方面淘汰落后产能,一方面鼓励发展新产业,培育新引擎,完成增长动力的转换与接续。

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卓勇良认为,新常态渗透入区域经济的各个方面,除了产业、企业的发展形态变化外,城市的空间形态也或因此而变。

在卓勇良眼中,集约式发展在浙江已初见端倪。当下要让大企业深深扎根浙江,通过总部经济等方式留住他们,还要为小微企业创造新空间,培育未来的大企业。“浙江要实现新旧动力转换,除了宏观方面的规划,更需要在微观上提高中小企业的创新意识,助其做大做强”。陈建军认为,培育一批具有不断的内生创新能力的小微企业,是实现浙江未来发展的重要力量。

“当然,这一切都是建立在走绿色、低碳、循环发展道路上的。”陆立军说,明净的空气、可游泳的河流越来越成为稀缺品,浙江花费巨大精力保护的绿水青山,越来越成为发展生态经济的巨大资本,是打造核心竞争力、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最大优势。

八面来风

相信市场力量

包纯田(浙江省金融办副主任):现在我们看到的更多的,是数字化的“新常态”,如GDP从12%掉8%、7%,或者6.5%。数字固然重要,但如果我们再继续以数字作为第一衡量标准的话,将是非常可怜和悲哀的。

新常态表现在哪里?今后的新常态是指衡量你所做的事情的价值含量。看它对社会、对人的福利水平是不是真的有提升,对国家财富创造有没有帮助,对中国GDP成长有没有助力,对全人类的文明发展有没有推动。

吴晓波(浙江大学管理学院院长):可以看到,整个经济的发展,进入到新的阶段,我们所面临的困难和问题也是在新阶段上的问题,而不是像过去以前很低水平上的问题,其性质是不一样的。我们中国的新常态,确实需要我们理性看待。我们要更加彻底地相信市场的解决能力,相信市场经济的力量。政府的工作其实也是一样的,怎么样让市场经济在浙江省发展,这里面有企业的努力,也有政府的努力。

有舍才有得

李佐军(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长):严格说来,目前中国经济并非已处于新常态,而是处于向新常态过渡的过程中。目前的主要任务不是保证在新常态下如何推进改革的问题,而是保证坚持全面改革以实现经济向新常态过渡的问题。至于如何顺利推进全面改革,关键是将顶层设计与发展群众首创精神结合起来,按照依法治国的思路,推进全面改革。

刘亨(浙江省政府咨询委员会学术委副主任):这时候就需要改革、另辟蹊径。要么走出去,要么好好转型。如果我们的浙商既不“走出去”,又不搞高端产业,那就是“死蛤蟆”一只了。要转型的话,毫无疑问要选科技含量高的,有市场头口水收益的,要往这方面去走。熊掌与鱼不可兼得,要学会“喝舍得酒”。有舍才有得,不然眉毛、胡子一把抓。

谢晓波(浙江省发改委副巡视员):浙江企业应从“人合”向“资合”转变,即从以人缘、地缘、血缘为基础的股东个人信用组成方式转变为资本结合的企业型发展方式,实现投资合作发展。浙江百姓存款多而无“花销”,“资合”可以整合浙江民间资本,合力发展,实现社会资源的合理分配。

带来稳定预期

潘建成(国家统计局中国经济景气监测中心副主任):经济进入新常态,会给资本市场带来更稳定的预期。经济的剧烈波动容易带来资本市场的剧烈波动,对资本市场的破坏性影响是巨大的,我们有过痛苦的教训。而未来更有质量、更有效益的增长,会为资本市场的回暖奠定经济基础。

秦虹(住建部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房地产也将进入新常态,未来房价会有涨有跌。如何应对市场的复杂和多变,对房企来说成为其能否持续发展的关键。业内人士预计,行业专业度和门槛的提高将导致大部分房企遭淘汰,房企有望开启并购时代。

陈道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综合研究室主任):当进入“新均衡常态”后,货币财政等手段则宜上升到更常规的工具使用上。在价格、数量及行政手段的选择上,也需要动态调整。

(王鹏杰收集整理)

财经微观点

稻谷市场将保持坚挺

彭超(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高级市场分析师):

受国家水稻最低收购价格政策影响,自年初以来我国稻谷市场总体呈现稳中略涨的状况,预计今年水稻价格总体将比上年有所提高,处于高位平稳运行状态。

今年国内稻谷市场将保持坚挺。但受南方粮库库存较大、国际稻米市场价格较低、进口数量增加等因素影响,不排除产生市场波动的可能。

勒住职务消费野马

国企、央企不是私产,承载着公众的利益与诉求,

花多少钱、怎么花绝不是企业自己的事。合理控薪,勒住职务消费这匹脱缰的野马,可以说啃到了国企改革最硬的一块骨头。总的导向,当“各尽所能、按劳分配”,与创业贡献相匹配,与竞争风险相契合,与选人方式相适应。

股市建设不容忽视



在货币总量宽松的背景下,中小企业融资难和融资贵的难题始终没有合适的解决办法,进而阻碍了中国经济的增长,这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忽视了股市的建设,我国的融资向来以银行体系为主,而融资成本最低的资本市场融资体系一直规模很小,后者占比大概仅有15%左右,这和发达国家以资本市场为主的融资体系形成鲜明对比。如果中国经济的融资体系能够转以资本市场为主,中国经济面临的很多矛盾都可以迎刃而解。

用法律遏制规划乱象

当前,城市发展规划十分迅速,规划也应

与时俱进,进行必要的有序调整。关键在于,这种调整须在规范的前提下、在健全的监督机制下推进,而不是少数领导“灵感乍现”的“拍脑袋”。一方面,规划的编制与调整要尽可能让百姓参与,规划的实施也要接受社会监督;另一方面,要优化政绩考量方式,更多实行过程式政绩评估,避免短期化、极端化的唯结果导向。同时,完善决策失误责任追究机制也十分必要。实践证明,此举能够更好地约束“非理性决策”冲动,更好促进依法办事和民主决策。

网络理财体验更重要

互联网企业往往强调要

适应客户需求的转变,不能仅仅把客户当成产品销售对象,而是要做产品服务问题的解决商。因此即使是理财产品,也不能仅仅考虑持有人是否盈利,盈利多少,而要更多考虑是否便捷,是否满足了需求。再回到余额宝,尽管收益率下滑了,但用户数仍在稳步增加,说白了,很大一部分“宝粉”持有余额宝不只为理财,更多是看中余额宝的便利性。随着消费场景不断拓展,余额宝作为消费支付工具和现金管理工具的属性,也得到广泛认可。这种种好的体验,仍然会对“宝粉”产生足够的吸引力。